



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研究

邢建国\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软科学基金项目
苏州大学“211 工程”学科建设项目

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研究

邢建国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将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动置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环境下加以考察,阐明了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换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获取全球化收益的客观要求。书中对双引擎过渡期贸易战略选择,投资引擎的动力及贸易扩大效应,以及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的微观基础和政策选择等做了深入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实践,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具有理论和实用价值。

本书可供经济界贸易与投资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参阅,也可供高等院校专业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研究/邢建国著. —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13-04650-5

I. 贸… II. 邢… III. 国际贸易-投资-研究 IV. F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622 号

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研究

邢建国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立信会计出版社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92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50

ISBN 978-7-313-04650-5/F·662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按照国际经验,一国经济国际化扩张战略方式的选择,既同该国国内经济成长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同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有着直接的联系。西方国家早在 16 世纪就通过贸易方式掀开了资本的近代经济史。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西方工业国开始进入以过剩资本输出或以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化扩张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环境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加上新兴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转入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为动力的双引擎经济增长阶段。可见,一国经济的国际化战略重点是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是我们认识一切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切入口。

本书在广义“走出去”概念的范围内讨论了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路径及其政策涵义。这一研究思路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的实际经验。本书的分析说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在推动一国国内经济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不同作用。同时,本书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由贸易拉动的单引擎阶段向贸易与投资双引擎拉动转型的“过渡时期”。从而,给出了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总体上,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进入贸易与投资双引擎发展阶段。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路径的调整显示,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扩张,已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战略变动的基本方向。可以说,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传统的依靠贸易扩张单引擎增长阶段向贸易与投资双引擎增长阶段的转变过程。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贸易与投资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增长效应是各不相同的。中国经济国际化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经济体系尚处于发育不成熟阶段,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还相当有限。因此,产品的国际化仍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主导方面。按照经济便于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调整和布局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环节。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

放格局的不断变化,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辅助性推动力,具有变动速度快、增长率持续上升、结构调整功能显著以及世界经济资源利用效率高的经济特征,从而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一个权数不断增大的变量。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贸易主导型经济增长阶段(即单引擎增长阶段)向贸易与投资双引擎增长阶段的转换的“过渡时期”。双引擎过渡期判断的提出,意味着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实现贸易与投资双重战略的整合,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基本任务之一。

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本书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对外贸易政策的分析框架,从而说明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提出了“投资兼顾型贸易政策”的战略思路及其实现路径。在由单引擎经济增长向双引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过渡时期,对外贸易战略可以被概括为: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基础的结构调整,以及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调整效应的对外贸易战略框架。该框架隐含着中国对外贸易扩张路径将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对外贸易增长目标变动: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目标已从传统的外汇增长转向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即从传统的静态收益转向贸易的动态收益。因此,贸易扩张的结果不仅是贸易的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将有利于培育中国企业的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要素,充分利用世界经济资源的市场竞争能力。把对外贸易的产品输出过程,变为熟悉和掌握发达国家市场变动规律的过程,从而为厂商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经验和市场条件。因此,改变贸易与投资不相关决策现象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对世界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同该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直接的联系。增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调整贸易结构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基础。按照国际经验以及中国的实践,产品出口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集群效应。吸引外资的集聚区域与出口基地的重叠效应,将推动中国技术创新向集群方向发展。因此,本书提出中国贸易战略基础的再造方向:从“大制造”转入“大研发”。而现阶段的大研发主要表现为“集群式研究开发”。

第三,按照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兼顾对外投资增长效应的复合型贸易政策改造思路。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单纯是贸易政策思路不仅难以摆脱贸易摩擦加剧的困境,而且,同进一步拓宽中国对外开放路径不相适应。所谓“兼顾投资增长的复合型战略”,包涵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扩大贸易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基础性功能,引导企业优化海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二是通过充分利用投资机制,减少贸

易摩擦,稳定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第四,境外加工贸易是实现贸易与投资机制融合的重要方式之一。境外加工贸易不仅有利于带动国内原料、设备及相关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并在东道国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而且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拓和企业国际形象的确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开展包括资源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以及服务导向型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境外加工贸易,将不仅有助于中国结外贸易的稳步扩张,而且更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升级。

在充分解析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条件和措施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有效资本型 FDI”的国际直接投资概念,并主张通过投资活动地区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释放投资的贸易扩张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企业“走出去”的方式从产品贸易扩展为要素的直接流动,从主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一步扩展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可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意味着一国参与世界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因此,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代表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但是,按照本书对双引擎发展阶段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基本判断,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顺贸易的结构优化。本书将这种投资战略概括为“顺贸易投资战略”。这一战略所包含的投资选择基准如下:

第一,顺贸易扩张的投资目标基准。历史地看,大多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机制的启动与世界贸易壁垒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外直接投资服从于贸易扩张的需要;而在微观层次上,先贸易后投资是大多数厂商“走出去”行为选择的一般模式。此外,西方 FDI 理论也说明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所面临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是厂商“走出去”的两个先后不同发展阶段。坚持在贸易扩张基础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符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实状况。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选择基准——产业内贸易量基准。该基准的涵义是,按照顺贸易扩张的要求,中国现阶段海外投资应当具有同国内企业进行中间产品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同国内企业的中间产品交易量,包括知识产品交易规模。因此,应当选择产业链长、加工环节多的产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当然,这一选择基准的约束条件是海外子公司具有市场“内部化”的优势与偏好。

第三,规避贸易壁垒基准。在由贸易逆差所产生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对那些贸易逆差较大,且短期内难以消除这种逆差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贸



易替代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应当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本书将这种投资战略选择归结为海外投资的“正贸易替代效应”。广义地说,所谓正贸易替代效应,是指在贸易环境恶化,贸易壁垒加剧的情况下,对原有贸易规模大国家和地区实施投资方式,是厂商占领海外市场博弈选择的效率体现。因此,笔者认为,积极发挥投资对贸易正替代效应,是增强贸易政策与投资协调性的有效途径。

第四,投资主体多元化基准。由于对外投资在中国具有快速增长的条件和趋势,把握投资的有效性是中国制订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的基本要求。而这种有效性则来自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选择模式。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表现为产权主体的多样性,而且还表现为厂商对外投资的优势存在显著差异: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边际产业等,都将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技术依据。总之,由多元化投资主体所架构的产业和区位结构选择具有顺贸易特征的对外投资,即为“有效资本型 FDI”。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整合的微观基础,在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动态提升特性的“可持续成长型企业群”。同时,一国能否实现由单引擎增长模式向双引擎增长阶段转换,关键在于企业成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建立在可持续成长基础上的国际化转换能力。因此,本书全面分析了可持续成长型企业的战略要求及其实现途径。实现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发展思路本身,意味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产生企业国际化的转换。为了说明这种转换的特殊性,本书提出“企业代际转换”的概念,并在企业代际转换概念的基础上,将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分解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成长:“代内成长”与“代际成长”。树立重视跨期绩效的科学发展观、强化战略资源储备,以及调整资本积累模式,是保障企业代内成长稳定性的必要条件。企业只有实现稳定的代内成长,才能为代际转换创造可靠的基础。由于企业的跨国代际转换是由单纯的国内经营向国际化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同其他类型的代际转换相比较,跨国代际转换具有收益大和风险高的经济技术特征。因此,反代际衰退则是企业在其国际化过程中而面临的主要难点。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则在于培育企业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成长的共同基础,从而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双引擎拉动阶段的一般基础。当然,由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尚处于起步和阶段,政策导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本书分析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主导作用基础上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激励、抑制与中性三位一体的政策框架。

总之,本书以“过渡期”判断为基本出发点,按照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趋势的

要求,提出兼顾投资增长的贸易扩张战略和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形成一种以贸易扩张为主导、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整合模式,而可持续成长企业群则成为战略整合的微观基础。因此,这项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书从贸易与投资战略整合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趋势,系统分析与论证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并从理论上阐明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与路径。因此,对进一步丰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理论具有学术价值。本书从开放经济体系出发,对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提出基本的理论估计,从而有利于为我国对外开放基本战略的调整提供决策参考。本书是从贸易投资一体化角度研究我国贸易与投资扩张战略,因而对现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微观层面上,本书特别分析了中国跨国公司培育的条件、路径和方式,并运用可持续成长所体现出来的企业代际转换分析方法,动态地描述企业国际化进程。因此,也有利于为中国跨国公司成长战略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目 录

1	总论:经济全球化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	1
1.1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1
1.2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约束条件	4
1.3	对外贸易:主导机制及其战略基础	10
1.4	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转换	23
2	贸易:双引擎过渡期贸易战略选择	31
2.1	双引擎过渡期与贸易扩张战略的目标调整	31
2.2	贸易基础再造:从“大制造”转向“大研发”	35
2.3	产品与区域的结构优化:贸易引擎能量的放大	39
2.4	投资机制的导入与贸易摩擦的规避	45
2.5	贸易与投贸机制融合的重要形式:境外加工贸易	49
3	投资:投资引擎的动力及贸易扩张效放	54
3.1	FDI 的贸易扩张效应:经验分析	54
3.2	西方 FDI 理论模型及其评价	61
3.3	FDI 引擎作用机理及其现实基础:有效资本	72
3.4	中国 FDI 产业选择基准及其政策思路	77
3.5	有效资本型 FDI 区位选择基准	87



3.6 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的整合 104

3.7 资本流与贸易流的互动: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112

4 整合:战略整合的微观基础与政策选择 118

4.1 中国跨国公司生长点:可持续成长型企业 118

4.2 “走出去”:可持续成长型企业的重要发展阶段 122

4.3 跨国公司的培育:代内成长与代际成长 128

4.4 跨国公司培育的战略重点:跨国代际转换 135

4.5 境外子公司的治理:公司治理结构的扩展 138

4.6 双引擎过流期 FDI 政策选择 149

5 结语 165

参考文献 167

后记 170

1 总论:经济全球化与增长动力 结构转换

1.1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产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化流动,使得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规范化和规模化,并导致经济国际化向其高级阶段——经济全球化(Global Economic Developing)——的跃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表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之一,是使得各国经济相互融合的程度迅速提高,从而使得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出现的新事物,而是自资本来到世间后便开始产生的一种扩张的表现。这种浪潮席卷全世界,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掀起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其主要内容是商品贸易的全球化。这一浪潮一直延续到19世纪,其主要成果是推动全球市场的逐步形成。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这一阶段曾出现过贸易与投资高度自由化的世界市场,但这一经济全球化进程被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殖民地体系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分工体系的拓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迎来了世界经济黄金时代,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以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生产经营跨国化、科技与产业梯度扩散为特征的经济大趋势,第三次全球化浪潮逐步形成。自1973年以来,包括外汇、债券和股票在内的流动金融资本先后开始了跨越国界的流动。并且,金融资本空前规模的全球流动有力地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然而,由于7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



的困境,各国为摆脱经济衰退再次求助于保护主义,在贸易及其他经济壁垒不断更新和提高的保护浪潮中,国家间的各种经济交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一度放慢,甚至出现某种停顿。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本国经济和提升综合国力上。与此同时,为实现最佳资源配置和最大经济利益,相互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国家经济的重大变化,往往会波及或牵动其他国家经济的变化,甚至全世界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如 1995 年发生的墨西哥危机波及北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又引发俄罗斯、巴西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了影响。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国际化的一种高级形态,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按照贝拉·巴拉萨的解释,“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同一范畴,是经济国际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代表着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与状态。作为一个过程,全球化意味着逐步消除不同国家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而作为一种状态,则表明各国民经济之间已经不存在各种形式的歧视(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而按照世界各国经济的融合程度,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以下特征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世界经济市场化(陈漓高,2001)。与传统的国际经济联系相比较,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并不在于世界市场空间范围的扩大,而在于各国经济融合的制度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平行的市场格局趋于终结,全球经济被整合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二是非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向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靠拢,市场的统一性程度空前提高。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市场机制的同构化,从而以统一的市场机制内在地融合国别经济,是全球化同传统的经济国际化的根本区别。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多边融合机制的形成。市场经济制度的全球化是退过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来实现的。经济运行机制实际上是资源配置规则的集合。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化过程,即全球要素按照统一的、规范的市场规则进行配置。这不仅使得资源配置效率



逼近于 pareto 最优,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规则成为多边融合的准则或范式。由于多边融合机制是建立在统一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世界各国的经济融合将因对市场经济规则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而被不断强化。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难以被中断或逆转。

最后,世界经济的治理方式:谋求多边、多层次以及全方位合作的冲突管理(丹尼·罗德瑞克,2000)。利益冲突是与国际经济融合一同发展着的,因为在纯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并不会形成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从而,也不存在制度安排上的“歧视”。只有当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产生时,这种歧视性待遇才会出现。国家经济联系越紧密,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冲突管理就成为国际经济治理不可缺少的方式,从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保障机制。

总之,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微观经济主体国际化冲动正在不断强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

首先,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将使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分工的路径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传统的国际分工不仅主要表现为垂直分工,而且国际分工通常表现为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发达国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当代国际分工则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立体发展的方向推进,并且,产业的国际转移将突破传统的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将延伸到发达国家,形成与发达国家对产业增值链的共享关系,即国际分工过程同时表现为“分割增值链”(slicing up the value-added chain)的过程(Krugman,1995)。因此,全球化不仅增强了结构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国际分工关系,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在更深层次上进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

其次,全球化条件下的产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将从过去的替代关系转变为平行共存或相互推进的关系。在传统的跨国经营方式下,一国的要素跨国流动往往构成对其贸易品国际交换的替代关系。而全球化推动着世界市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活动的空间空前扩大,形式日益趋于多样性。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性增强,替代性弱化。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交易结构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交易结构(包括商业结构和地理结构)的变动,为要素的跨国流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济空间。

再次,在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微观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公司价值极大化已经



摆脱了母国市场的空间约束,而转向全球市场的价值定位,即企业将通过创建一体化的、跨越国界的全球网络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地位。在这种新的经营环境中,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经营业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经营绩效。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价值定位是通过公司全球化战略来实现的。所谓公司全球化战略,就是微观经济组织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在国际性市场中创造独特优势的路径,并按照世界市场的要求构建和实施其经营战略,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最后,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主要地表现为信息技术革命。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世界市场不仅在范围与结构上经历深刻变动,更重要的是,世界市场的交易方式,交往方式以及竞争合作方式都将一同发生变革。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的逐步扩大,使得人们传统的“市场”概念已难以适应新的世界市场发展,交换关系的总和或交换场所等市场界定方法,都不足以涵盖全球信息网络条件下的世界市场的内容与体系。信息网络技术对世界市场的扩张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世界市场的规模是由市场的参与者创造出来的,形成“市场创造市场”的新的循环格局。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全球化的两种动力机制是不可消除的:一是“非制度全球化”驱动机制,即由于世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尤其是企业活动的国际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融合为一个整体。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二是“制度性全球化”驱动机制,即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世界各国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而相互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度,甚至建立国际性或区域性集团组织,对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作出某种制度性安排。因此,在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企业不是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国际化的问题。

1.2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约束条件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有效途径,同时,这一过程是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定背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跨国公司的勃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约 63 000 家跨国公司,同时拥有 70 万家境外子公司。跨国

公司已占世界总产值的 1/4,世界 500 强的企业绝大多数为跨国公司。当前的世界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跨国公司经济”。随着跨国公司经济时代的到来,20 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

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手段。1986~1991 年间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年平均仅有 1805.1 亿美元,而在 1995 年已增加到 3525.14 亿美元,1998 年已高达 6489.2 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其主角仍是发达国家。1986~1991 年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每年平均 1691.55 亿美元,1995 年为 3064.65 亿美元、1998 年为 5946.99 亿美元,分别占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93.77%、86.9%和 91.6%(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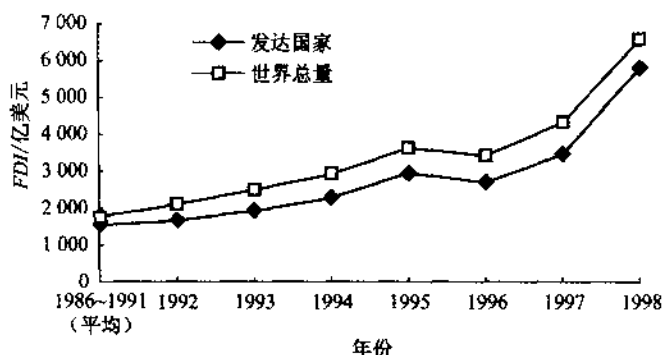


图 1-1 1986~1998 年发达国家 FDI 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速了 FDI 的输出,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1986~1991 年间平均仅有 113.31 亿美元,占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6.3%;1994 年发展到 349.29 亿美元,占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14.5%,以后一直保持着这一比重发展。1995 年分别为 456.42 亿美元和 12.9%,1996 年分别为 491.61 亿美元和 14.8%,1997 年分别为 611.38 亿美元和 14.4%。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还较小,但其增长势头是稳定的(参见图 1-2)。可以预见,只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发生逆转,发展中国家由单纯的 FDI 的东道国转向同时作为 FDI 母国的趋势将逐步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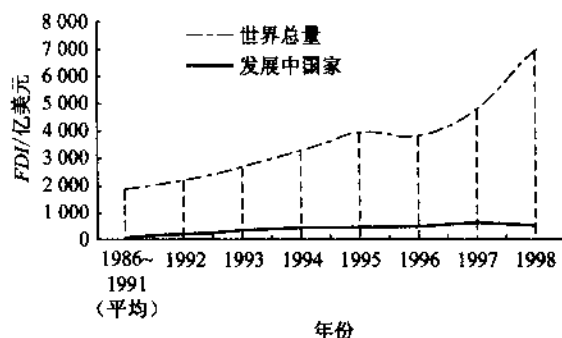


图 1-2 1986~1998 年发展中国家 FDI 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不仅是贸易大规模扩张时期,同时更是国际直接投资机制完善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之一。然而,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特大型国家”,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脱离国家规模这一特殊约束条件。按照经济学的划分标准,“大国经济”与“经济大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指国度的大小或“国家规模”,后者反映的则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实力,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组合关系(详见表 1-1)。

表 1-1 国家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不同组合

经济规模 \ 经济实力	经济大国 (A)	经济小国 (B)
大国经济(I)	AI	BI
小国经济(II)	AII	BII

表 1-1 中的“经济大国”也称“经济强国”,表示一国不仅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高,而且对世界市场甚至世界经济格局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过,由表 1-1 可见,经济大国与一国国度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一个国度较小的国家,同样可以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或经济大国(如 AII 型国家)。而“大国经济”概念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也无直接关系,它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的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它所反映的只是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国家规模”较大,如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较大以及人口众多等特性,表明该国能够产出较大的经济总量。但庞大的经济总量一旦与众多的人口数量相匹配,则按总人口平均的人均国民收入仍将是一种低水平均衡(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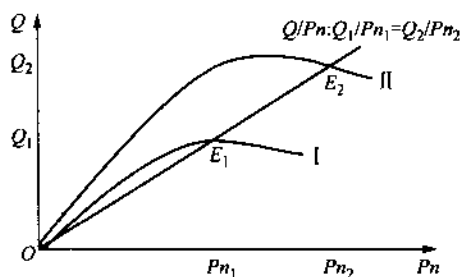


图 1-3 “BI 型大国经济”均衡

图 1-3 中,要素供给 P_n (如人口) 由 P_{n1} 增加到 P_{n2} ,但由于产出效率没有提高,尽管产出水平 Q 由 Q_1 上升至 Q_2 ,该经济体系单位要素均衡产出率 Q/P_n 则由最初的 E_1 点回落到 E_2 点。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经济便表现为一种不发达的经济体系,或称“经济小国”(如 BI 型国家)。

可见,国度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经济的强弱。按照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中国属于 BI 型国家范畴。中国人口已由建国初期的 5 亿增加到目前的 13 亿,并且正以每年 1000 多万的速度递增。据人口统计学家估计,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在 21 世纪中叶出现,届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6 亿,其中约有 1/3 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中国自然资源总量虽然很大,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口平均的资源占有量却十分有限,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数的 1/2。如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世界的 32%,森林为 14%,草地为 32%,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均值的 1/4,排名世界 100 位之后。此外,许多工业发展所需的重要矿产资源,如铁、铜等均需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资源利用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 10 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同是经济小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小国”即 BI 型国家,与作为小国的“经济小国”即 BII 型国家,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局限于两类国家经济的总量规模或 GNP 的绝对数存在着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大国经济条件下的要素的需求及其配置存在着与小国经济不同的特征。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分析 BI 型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

首先,同经济大国相比,经济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下,是经济小国的共同经济特征。但 BI 型与 BII 型国家相比,两者的经济总量规模却有着显著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到这两类经济小国的国内均衡,因而,可以假